

# “行为戏剧主义”视域下政府道歉行为的修辞分析

## ——以菲律宾政府“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为例

甘莅豪，曹晓彤，唐小慧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勇于道歉是国家执政文明的一种表现。在国际冲突事件中,国外不少政府借用道歉行为产生的戏剧性象征意义,有效地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形象。采用建设性话语分析视角,运用“行为戏剧主义”理论框架,选取菲律宾政府“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行为进行修辞分析,发现了政府针对国际事件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动机选择的“人类共同价值优先”、场景选择的“组合原则”、身份选择的“配合准则”、话语选择的“14策略原则”和时间选择的“借势原则”。

**关键词:**建设性话语分析;行为戏剧主义;政府道歉;国际事件;马尼拉人质事件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22)01-0001-10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形象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家、政府和首脑频繁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就国际政治事件进行道歉,以期重新修复自身在国内和国际的不良形象。从议题上看,这些道歉行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针对国内产生全球不良影响的不公正政策和行为道歉。这些道歉行为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其主要道歉对象为国内少数民族或者少数群体,比如美国1988年就二战时期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进行道歉和赔偿;2011年10月6日和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分别以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就1882年制定的这项歧视性法案向全体美国华人致歉。2018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长罗伯逊就歧视华人历史正式道歉。第二方面,针对国际不人道行为道歉,比如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就二战罪行向犹太人进行道歉;1993年美国政府就派兵支持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道歉;1993年伊丽莎白女王对新西兰毛利人道歉;2002年朝鲜金正日就绑架日本人质事件向日本道歉;2010年奥巴马就危地马拉“梅毒”事件道歉;2015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向韩国慰安妇道歉。

虽然这些道歉行为的背景、动因、目的和效果皆不相同,但是都引起了学界、政界和公众不同的评价,也都面临着任何政府在公众领域的道歉行为可能造成的各种悖论问题。<sup>[1]</sup>因此,本文希望从建设性话语分析视角考察并分析政府道歉事件,并借此提出政府针对国际政治事件道歉的一些基本原则。

### 一、行为戏剧主义理论: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转向建设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评语言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其将社会批评理论与语言分析结合起来,逐渐成为跨学科的方法论研究领域。早期梵迪克(Van Dijk)的社会认知学派,

收稿日期:2021-1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公共危机责任政府道歉行为的话语修辞研究”,项目编号:20JHQ096;国家重大课题“网络空间社会治理语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ZD299。

作者简介:甘莅豪(1977-),男,江西高安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传播学、修辞学。

曹晓彤(199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修辞学。

唐小慧(1994-),女,安徽马鞍山人,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研究方向:政治传播。

沃达克(Wodak)的话语历史学派,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的批评实在论和奇尔顿(Chilton)的认知政治话语分析皆致力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不平等呈现。随后由于不满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因素所作的批评过多,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世界,很容易使人丧失信心,克雷斯(Kress)提出话语分析应该从解构走向建构,应该告诉“设计者如何根据自己的兴趣,分配表征符号资源,塑造未来”。<sup>[2]</sup>马丁(Martin)在他的启发下,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致力于寻找具有积极倾向的文本,并揭示该文本中隐含的各种积极意图,比如分析人们如何通过话语推动社会进步,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人类平等等议题。<sup>[3]</sup>

实际上,克雷斯的话语不仅预示了积极性话语分析的可能性,也暗示了建设性话语分析可能性。也就是说,证明既有文本中的积极意图,进行积极性话语分析,只是话语分析工作的第一步,其还不够完全。话语分析还应该进行第二步分析,即通过第一步分析,寻找话语策略,提出适应社会新需要的话语规则,重新建设新的话语文本,从而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简而言之,建设性话语分析的分析逻辑应该如下:首先,优先确定话语的价值、意图和意识形态。任何文本都是权力建构的文本。而意识形态决定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被运用到哪些目的上。和批评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文本揭示意识形态不同,建设性话语分析首先确定言说者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意图,其次寻求符合话语意图、话语价值和话语意识形态的文本,再次分析该文本为了实现该意图使用了哪些话语策略和遵循了哪些话语规则。最后,在未来出现类似案例的时候,运用这些话语策略和规则建设文本,在实践中重新对这些规则进行检验,并逐渐完善。总之,和批评性话语分析重视“分析”,擅长把整个语篇分解成一个一个语言符号不同,建设性话语分析旨在“组装”,其探究言说者如何根据自己意图,把一个一个语言符号和语言使用的语境要素拼合成一个语篇。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核心目的在于“揭示”,旨在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话语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不同,建设性话语分析核心目的在于“实现”,其旨在通过话语实践实现言说者的意图或者推动社会进步。

建设性话语分析可以基于语言学各种理论,比如修辞学、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理论灵活对话语进行分析,寻找特定社会话语现象中的话语规律。本文尝试建构“行为戏剧主义”理论,对人际交往中的各种“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其内涵如下:

#### 1. 以“言语行为”为分析的核心对象

根据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符号,也是一种建构世界的行为。胡范铸将该理论拓展到修辞学领域,并将“言语行为”定义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sup>[4]</sup>根据该定义,道歉行为、威胁行为、请求行为、谎言行为、新闻写作行为、会议行为、广告行为和新闻发言行为等都属于“言语行为”。

#### 2. 根据戏剧五要素分析“言语行为”

其实“言语行为”不仅可以被视为一种“游戏”,还可以被视为一场“戏剧表演”,即“言语主体分析和调动各种角色、场景、时机、话语、动机资源改造人类社会的表演行为”。

在该定义中,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还可以是国家。而“表演行为”和主体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其可进行正向改造社会,促使人类社会进入良性循环,也可以负向改造社会,导致人类社会进入恶性循环。“改变人类社会”和关注过去的“批判性分析”不同,其具有“未来主义”倾向,<sup>①</sup>指导言语主体如何设计话语,进行表演,改变世界和社会。根据该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和批评话语分析探讨话语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不同,建设性话语分析在组装话语,实现言说者目的时,不能局限于对话语进行分析,<sup>②</sup>还应该探讨言说者的动机、身份、场景和时机。具体如下:

动机:分析言说者或社会情景希望满足哪些意图,以及需要达到何种效果。

话语:分析言说者如何设置议题,如何设置争议点,如何设置论辩结构、如何设计故事情节等等。

角色:分析言说者如何挑选言说者身份,如何让不同身份的角色配合,比如政府科层制工作人员之间的配合、媒体和政府之间的配合、意见领袖和政府的配合、受害者和政府的配合等。

场景:分析言语行为的媒体、社会、历史和国际背景;分析言说者如何挑选行为发生的地点和媒介情景。

时间:分析言说者如何把握言说的时机、频率和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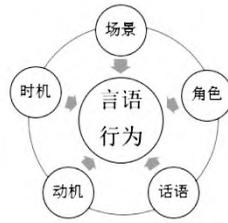


图1 “行为戏剧主义”理论

值得注意,五要素之下的要点还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比如话语要素下就涉及了“争议点”理论。而“争议点”理论在西方修辞学中一直是主流理论。比如赫尔玛格拉斯将“事实”“定义”“品质”“程序”确定为修辞发明的四大争议点。“事实争议点”指围绕事实认定发生意见冲突。“定义争议点”围绕事情或者事件的属性和界定发生意见冲突。“品质争议点”围绕对事情和事件的归因、看法和评价发生意见冲突。“程序争议点”围绕处理该事情和事件的程序和标准发生意见冲突等。而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也可以充实“动机”要素分析。哲学的“主体性”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角色”等要素。

### 3. 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具体案例,提炼出“言语行为”表演的原则

塞尔将“言语行为”规则分为“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构成性行为规则”区分了不同“言语行为”之间的边界。“策略性规则”则影响了“言语行为”的效果。而“言语行为”是一种戏剧表演。为了达到最好的表演效果,也需要在调动“五要素”时遵循一些表演的原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是一种艺术行为。艺术行为要求遵循一定的策略性原则,但是又必须超越这些原则。因此“行为戏剧主义”理论总结的一些表演原则,只能提供启发,而非必须遵循。也就是说,言说者必须根据具体情景,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 4. 根据提炼的原则,设计下一次类似“言语行为”的修辞实践

虽然修辞学大师昆提利安对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对修辞作为一门实践和一个领域究竟用处多大持怀疑的态度,对严守教条、循规蹈矩地照章办事更是坚决反对,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理论,从实践中总结规则,并在下一次实践中提供启发,却也存在实际价值。

## 二、菲律宾政府“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行为分析

由于菲律宾政府就“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情节最为曲折,且该道歉行为距今已11年,其事先准备情况和道歉原因在各种访谈资料和记者报道中讨论最为频繁,留存资料也非常充分。本文拟依据行为戏剧主义理论对该道歉事件进行事后反思和分析。

### (一)事件介绍

2010年8月23日,一辆装载25名(包括22名香港乘客)乘客的旅游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被菲律宾前警察罗兰多·门多萨劫持。该劫匪原是菲律宾高级警官,因涉嫌抢劫、勒索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而被解雇。经过谈判,在长达11个多小时对峙过程中,6名香港游客于中午前获释。23日晚7时40分左右,菲律宾警方实施突击解救行动,香港游客中8人死亡,6人受伤。媒体报道称,菲方在事件中存在谈判失策、营救无序等过错,一再错失良机,导致惨剧发生。此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不仅面带笑容视察现场,而且在新闻发布会上面露笑容,由此受到公众指责。同时,当地警员在现场带笑拍照合影留念,也引起港人愤慨。此后数年时间里,尽管经过多次磋商,但菲政府拒绝道歉亦无意赔偿,因此香港对菲方进行了包括旅游、签证等多方面的制裁。

“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具体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事发,僵持,道歉与善后。第一阶段:事发。事发当时政府以强硬态度回绝绑匪的复职请求,并派出警方抓捕控制其弟,同时实施了欺骗绑匪的行

为。然而,与此同时,菲律宾多家媒体全程拍摄直播案件过程,给了绑匪通过大巴车内电视,了解警方部署的机会,并在无形之中加重了绑匪的精神压力,从而导致“马尼拉人质事件”以惨案收尾。总之,在整个人质营救的过程中菲律宾政府存在着不可推卸的重大失误。第二阶段:僵持。2012年,人质事件两周年,菲律宾政府仍然拒绝道歉,同时菲驻港领事反指港人不懂原谅。同年5月,阿基诺三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当年可处理得好一点,但他依然拒绝就事件正式道歉。2013年10月23日,马尼拉市政府代表抵港递交人质事件道歉信。但菲总统阿基诺同时表示,菲律宾政府不会就马尼拉人质事件道歉。这一阶段的争议点主要在于:菲方单方面认为“马尼拉人质事件”已经解决了,认为“马尼拉人质事件”的责任在于“失常枪手”,而政府不应该为个人的行为道歉,这不符合菲律宾一贯的“文化传统”。而中方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受害者家属,均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三阶段:道歉与善后。2014年4月2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发表联合公告,菲律宾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正式向受害者及家属致歉。但是中方香港政府和受害者家属认为菲方道歉级别不够,鉴于国际冲突事件的严重性,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应该亲自道歉。然而阿基诺一直没有道歉,直到2018年4月12日晚,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会见菲律宾劳工时,才就“马尼拉人质事件”正式道歉,长达八年的“马尼拉人质事件”最终解决。

## (二)基于“行为戏剧主义”理论的分析

### 1. 动机分析

针对“马尼拉人质事件”,菲方一共进行了两次道歉。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一次道歉的动机。第一次道歉的代表是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道歉形式采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发表联合公告的形式。不过,该公告并没有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本人的签名,也并非由他的特使宣布。虽然埃斯特拉达表示自己代表着菲律宾政府和总统本人的意愿,但是总统始终未亲自出面进行道歉。这和“5·9台湾渔船在菲遇袭事件”的待遇相比层级有所降低。通过对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个人经历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埃斯特拉达本名何塞·马塞洛·埃杰西多,曾作为菲律宾著名电影明星拥有20多年从影经历。1998年当选菲律宾第13任总统;2001年因收取贿赂和回扣被指控,引发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被迫下台;2007年9月被判终身监禁,同年10月获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特赦。2013年5月14日中期选举,埃斯特拉达击败林雯洛,当选马尼拉市长。在选举市长期间,其一直宣称自己当年入狱是因为被迫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事实上,埃斯特拉达本人的政治活动非常频繁,并希望再次角逐2016年总统选举。显然,埃斯特拉达希望通过道歉行为,一方面和现任总统阿基诺坚决不道歉的行为进行对比,塑造自身良好政治形象,一方面希望维护马尼拉市作为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从而重新吸引国内外游客,增加自己的政绩。此外,马尼拉市华人实力雄厚,而中国城正好位于马尼拉市,并且是马尼拉市的经济贸易核心区,埃斯特拉达也想通过道歉向该市实力雄厚的华人示好。另外,马尼拉市市长埃斯特拉达对香港的个人感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埃斯特拉达声称自己父母新婚时就是在香港度的蜜月。他表示:“马尼拉和香港之间(关系)一直就非常紧密,香港对我自己来说也非常亲切。”

第二次道歉的代表人物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其采取了在会见菲律宾劳工会议上进行“口头道歉”的方式。杜特尔特在当天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对我们非常友好,中国爱我们,菲律宾也爱中国。在我的任期之内,我确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长久持续下去。”<sup>[5]</sup>通过这段发言,我们可以知道,此次总统道歉其实暗含着杜特尔特有意推动中菲关系朝良好方向发展的意图。回顾中菲之间的关系,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建交40多年来,一直友好相处,然而自阿基诺三世上任后,中菲关系迅速下滑。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2016年6月上任以来,一反其前任阿基诺三世的做法,停止南海争议,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外交方面,杜特尔特上台后,力图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菲律宾自身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等国家大打人权牌,干涉菲律宾内政,迫使杜特尔特调整对美一边倒政策,寻求中国的平衡。经济方面,杜特尔特政府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推行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可以说菲律宾当前的发展目标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菲律宾想要实现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需要中国的援助。<sup>[6]</sup>另外,中国民众对菲律宾国家之前的不好

印象,以及赴菲旅游警告等多项措施让菲律宾经济受到负面影响,杜特尔特除了要促进中菲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外,还需要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此次菲律宾总统的道歉,一方面是向中国示好,促进中菲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中国援助,为本国发展战略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中国人尤其是香港地区民众与菲律宾民众的关系,试图消除两国人民的隔阂,重建互信与好感。

另外,从个人形象塑造方面看,杜特尔特自上任以来就一直以“铁拳市长”“粗口竞选人”等在政治上具有强硬态度的形象示众。而此次,他针对上一任政府的错误行为进行道歉,可以起到下面两方面作用:第一,有利于巩固自己政权的公正合理性,起到“侧面敲打”前任政党的作用。杜特尔特在演讲中也说到“我们需要平息中国人民的情绪,此前一直没有人道歉,那么现在让我来做吧。”这些话语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道歉行为是在补救上一任政党的失职。第二,有利于扶正自己在国民心中的形象,中和自身过度强硬的气质。而道歉本身带有的示弱和反思性质,可以为杜特尔特自己增添些许“人情味”。

## 2. 时机分析

“马尼拉人质事件”自2010年至2018年已过去八年,为何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前任菲律宾总统迟迟不肯道歉?为何马尼拉市市长埃斯特拉达选择在2014年道歉?又为何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选择在2018年突然道歉?两次道歉时机的选择又有什么深意呢?

第一次道歉时间发生在2014年4月23日,距离埃斯特拉达在2013年5月14日就任新一届马尼拉市长只过去了不到一年。严格上来说“马尼拉人质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埃斯特拉达的任期之内,但他为何选择在上任短时间内赴港道歉呢?这是因为该道歉有助于巩固其新政治地位,赢得良好的社会声望。埃斯特拉达在赴港会面时多次提到他不仅是马尼拉的市长,还特别强调他是菲律宾的前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他对现政府某些做法的不满。事实上,就“非任期内”发生的案件进行道歉的压力要小于任期内,因为后者面临着承认自身错误和失职查办的风险。而埃斯特拉达的道歉首先排除了失职风险,其次还能为自己争取良好的声誉,不失为一举两得之举。

第二次道歉时间发生在2018年4月12日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会见菲律宾劳工时就“马尼拉人质事件”进行道歉。这是杜特尔特第二次非正式访问香港。在此之前,他于4月10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之后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三天的非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杜特尔特唯一的一场公开活动就是与居港的菲律宾劳工会面,并在演讲中就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正式道歉。那么,杜特尔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次访港期间进行道歉呢?

首先,与2017年的第一次非正式访港相比,此次时机更加成熟。从中菲两国的关系来看,此时中菲双边关系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两国高层往来密切,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游客来源地。<sup>[7]</sup>此次杜特尔特参加完博鳌亚洲论坛之后,中菲之间的合作将再上一个台阶,正如杜特尔特在当天的演讲中多次提到,现在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进入到最好的时期,菲律宾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时期对2010年发生的人质事件进行道歉,可以进一步修复中菲之间的关系,推动中菲两国的合作交流更上一层楼。

其次,杜特尔特于2018年1月27日请求中国帮助,让菲律宾劳工入华工作。据菲媒体称,很多在外务工的菲律宾人都曾遭雇主虐待,其中一些人最终自杀。于是杜特尔特就表示,若再有外国雇主继续“虐待”菲律宾劳工,他将会请求中国帮助,让菲律宾劳工入华工作。所以,此次道歉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香港民众和在港菲律宾民众的关系,增强彼此的信任和好感,为以后菲律宾的劳工输出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后,菲律宾将于2019年举行中期选举,如能掌控国会,杜特尔特阵营的话语权会更有效。当前,香港约有22万名菲律宾人,杜特尔特此次进行道歉,无疑是塑造了一个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总统形象,有助于为2019年的中期选举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 3. 角色分析

该部分包括“道歉主体分析”和“参与人员分析”两部分。

### (1) 道歉主体分析

不同政治身份的人道歉,其道歉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马尼拉人质事件”第二阶段僵持不下的一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受害者家属希望菲律宾政府,也就是国家总统能亲自出面为菲方解救人质不力等酿成惨剧的原因道歉。因为菲律宾总统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其代表整个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在受害者家属的眼中“马尼拉人质事件”不仅仅是单个市级政府或者是某个区域的责任,而是整个菲律宾国家的责任,所以仅由马尼拉市长道歉并不够,只有菲律宾总统亲自出面道歉才能体现全体菲律宾国民对受害者的尊重。

## (2)参与人员分析

第一次道歉的其他参与人员主要还有菲律宾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警察总长普里西马、香港特区首长梁振英等港府官员以及受害者和家属代表,同时还有在场的媒体记者。埃斯特拉达首先邀请受害者和家属代表,以正式访问的形式赴港道歉,同时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公告,解决和处理受害者及家属就道歉、赔偿、惩处负责官员和其他人士及采取措施保障旅客安全所提的四项要求。而本次道歉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通告发布一个小时之后,香港针对菲律宾的旅游警告等级就由黑色调整为四年前的黄色。

不过,通过道歉决议案的马尼拉市是组成菲律宾首都地区“大马尼拉”的17座城市之一,而埃斯特拉达仅能以“马尼拉市长”的身份向8名遇难香港同胞家属道歉。因此,这次道歉可以说是菲律宾首都政府的道歉,但不能视同为大马尼拉地区政府道歉,更不是菲律宾政府道歉。这也是遇难者家属不认可这次道歉的重要原因,家属们认为菲方派遣马尼拉市长而非菲律宾总统进行道歉,明显体现出要将“马尼拉人质事件”地域化、低调化处理的意图。

第二次道歉的参与人员主要有居港的菲律宾国民及媒体记者。道歉时有2000多名在港菲律宾人参加会面,而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并没有到场。由此可知,该道歉并不是专门针对事件的受害者而说的。事实上,有记者曾采访过受害者,他们都表示事隔多年,道歉对他们及受害者家属意义不大,不过有比没有好,并希望这次道歉可以为事件划上句号。可以说,此次道歉更大程度上是为杜特尔特本人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第一,向中国示好,表达杜特尔特新的外交政策,即加强中菲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第二,向居港的菲律宾民众传达政府愿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态度,增进菲律宾民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信任与好感,进一步为自己的国家战略服务;第三,改善中国人民尤其是香港民众对菲律宾国家和人民不良的印象。

## 4. 场景分析

该部分包括“地点分析”和“媒介分析”两部分。

### (1)地点分析

道歉地点的选择往往会对道歉的效果产生很大影响。“马尼拉人质事件”两次道歉的地点都选在了香港。那么,为什么不选在事件发生现场,或者邀请受害者和家属代表来菲律宾进行道歉呢?首先在第一次道歉中,马尼拉市长亲赴香港进行道歉有助于充分展现道歉的诚意,而如果仅仅只是在菲律宾进行道歉,诚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自人质事件发生之后香港人民对于菲律宾的抵触情绪非一日所能瓦解,邀请受害人再次前往菲律宾几乎不可能,同时亲赴当年遭受绑架的现场对于受害者也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刺激,所以道歉地点不可能选在菲律宾。

其次,为什么不选在受害者家中进行道歉呢?因为,人质事件距离第一次道歉已经过去将近4年,离第二次道歉更是过去8年,菲方贸然前往受害者家中很有可能会惊动受害者及其家属,而且如果家属情绪激动,还有可能造成负面效果。事实上,“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影响早已上升到菲律宾和香港两个地区的层面上,所以选择在有港方官员从中斡旋的情况下道歉,对于菲方来说既有安全保障又名正言顺。第二次道歉选择的地点依旧是香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之所以选在劳工会面的地点进行道歉,关键在于场合非正式,氛围比较轻松。杜特尔特一直有意增进菲律宾与香港的关系,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在非官方见面会上,借助总统道歉向港人展示出来的诚意,可以推动“菲佣”劳工问题的解决,为在港务工的菲律宾人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和生存环境。

### (2)媒介分析

媒介的选择之上,两次道歉略有不同,第一次采取的是香港政府与菲律宾首都政府发表联合公告

的形式,而第二次却是总统面对公众演讲的形式。为什么会选择两种不同的形式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道歉马尼拉市长面临最紧急的问题是解决家属的诉求,同时尽快解除香港对菲律宾的经济制裁,而采用联合公告的形式是最快捷和最标准的。

第二次道歉,杜特尔特之所以采用公众演讲的方式,是因为可以借这个机会来重塑自己的个人形象,使道歉更具人情味和戏剧性,也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国家总统亲自公开道歉通常被认为是层级最高、最郑重的道歉方式,杜特尔特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将横亘在菲律宾与香港人心中长达8年的“马尼拉人质事件”这个心结彻底解开,将这次事件彻底翻篇结案,从而推动菲港关系走向正轨。

### 5. 话语分析

该部分包括“道歉策略”和“话语选择”两部分。

甘莅豪(2017)指出道歉行为有14步话语策略可供选择:第1步,详细地陈述错误发生的过程;第2步,表示后悔之意;第3步,表示用于承担责任;第4步,确认受害者的范围;第5步,请求原谅;第6步,和受害者寻求和解;第7步,指出道歉后希望达到的效果;第8步,对各种批评者详细、公开、毫无隐瞒地披露各种信息;第9步,提供各种解释;第10步,重申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第11步,提供补偿;第12步,追究责任;第13步,提供正确或者修正的行为;第14步,表示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sup>[1]</sup>

以下我们将针对两次道歉的文本:第一,2014年4月23日香港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发表的联合公告;第二,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2018年4月12日演讲的道歉部分,并结合“道歉14策略”逐句进行分析。

第一份文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菲律宾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今日发表联合公告。公告如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同意就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发生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及菲律宾政府同意以下述方式,解决和处理受害者及家属就道歉、赔偿、惩处负责官员和其他人士及采取措施保障旅客安全的四项要求。

菲律宾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并对他们蒙受的痛苦表达最诚挚的哀悼。(第2步,表示后悔之意)

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已就此致函所有受害者或其家属。(第4步,确认受害者范围)

菲律宾人民为体现对港人的伤痛感同身受,(第6步,与受害者寻求和解)

以及弥补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损失,将会向受害者或其家属致以额外的慰问金,以表达最诚挚的关怀。(第11步,提供补偿)

菲律宾政府已向香港特区政府保证,正采取措施追究须负责的人员,并尽早完成余下的程序。(第12步,追究责任。)

菲律宾政府承诺会向香港特区政府交代尚余程序的进度。(第13步,提供正确或修正的行为。)

菲律宾政府已向香港特区政府保证会致力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第14步,表示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菲律宾政府已实施一系列措施,保障访菲旅客的福祉及安全。(第13步,提供正确或修正的行为。)

从这份联合公告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其采用了“道歉14策略”中的第2、4、6、11、12、13、14共计7种道歉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其没有使用或者特意回避的道歉策略窥见菲律宾道歉背后的深层目的。没有使用到的策略有:第1条,详细的陈述错误发生的过程。第3条,勇于承担责任。第5条,请求原谅。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截止到联合公告发布的那一天,菲律宾还是不愿意承认“马尼拉人质事件”是政府的失职,所以他们不正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试图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只是站在一个客观的局外人角度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哀悼和慰问。在文本中菲律宾采用了英文“Regret”一词,没有使用既要承认错误又要负责任、最标准的英文道歉用词“Apology”。对于这一点,菲律宾方面的辩解是,之所以不

用“Apology”是因为他们想要选择一个更好的、在外交场合更能被接受的词。而家属对此虽然无奈,但依然表示,相对之前阿基诺的冷漠,这次他们感受到了菲方的诚意,所以不会再纠结用词了。殉职领队谢廷骏的兄长谢志坚也称,惨剧是因为菲律宾政府一连串失误造成的,这次道歉言论属于正面,就算迟来,总好过没有。

另外在公告中没有使用的策略还有:第7条,指出道歉后希望达到的效果;第8条,对各种批评者详细、公开、毫无隐瞒的披露各种信息;第9条,提供各种解释。第10条,重申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由于遗漏上述道歉策略,这次菲律宾道歉话语存在较大缺陷。不少批评意见指出:2013年10月初,在印尼出席APEC会议期间,特首梁振英代表全体港人约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向其郑重提出:菲律宾政府须就3年前发生在马尼拉的香港人质惨剧向港人道歉、赔偿。当时阿基诺总统竟然面带微笑道:“这是香港和菲律宾两地文化的差异,菲律宾没有为他人过失而道歉的文化,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本次2014年的道歉话语没有借机重申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实则进一步损害了菲律宾的国家形象。

第二份文本如下:

请让我以菲律宾总统的身份,并代表菲律宾民众,(第3步:勇于承担责任)

从心底里向在场或者不在场的中国人表达正式歉意。(第4步,确认受害者范围。)我们对当时的事件感到遗憾。(第2步,表示后悔之意。)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第10步,重申社会公认的价值观。)

我确保以后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第3步:勇于承担责任。)

类似事件永远、永远不会再发生。(第14步,表示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这段简短的道歉中采用了“道歉14策略”中的第2、3、4、10、14共计5种道歉策略。杜特尔特的道歉相比于4年前的联合公告最显著的特点是:勇于承担责任。这是菲律宾总统首次对“马尼拉人质事件”进行公开道歉,代表着全体菲律宾国民对于“马尼拉人质事件”的重视与反思,这也是本次道歉显得格外珍贵的原因。并且,杜特尔特还提到了“人道主义”价值观,这是一条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接受的价值观,不仅有重申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树立其拥有人道主义关怀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映射了前政府“缺乏责任感”“不人道”的执政弊端,有利于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杜特尔特回避的策略虽然有10条之多,仍旧存在没有明确说出请求受害者原谅的缺憾,但是整体道歉效果反响较好,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马尼拉人质事件”不是发生在杜特尔特自己的任期之内,所以他本人不是伤害的促成者,也不是需要被原谅的对象。第二,人质事件距今已经过去八年之久,从积极的方面上看,不再反复打扰受害人家属,可以减少公众关注,获得安宁,走上生活的正轨。

### 三、结论

就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上道歉的这个案例本身,我们需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菲律宾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上需要道歉?首先,他国公民在自己本土受到本国人的残忍杀害,于情于理都应该给予受害者和家属安抚和慰藉。其次,此次人质事件以惨剧收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菲方救援不当,属于政府的失职行为,菲律宾政府理应为此承担责任。第二,为什么菲律宾的道歉之路走得如此艰难?道歉意味着自我否定,即该行为在心理上打击道歉者的自信,迫使道歉者放弃自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道歉本质上属于一种变相的“示弱行为”,将自己的错误坦然呈现在他人和公众面前,即使个人亦需要勇气,更何况国家,特别是其中涉及到政党的利益、国民的声誉和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等等,所以这也是菲律宾道歉为何姗姗来迟、避重就轻的原因。第三,菲律宾拖延道歉的行为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首先,错过了最好的道歉时机。如果菲方在案发过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进行正式道歉,就更容易获得受害者和家属的谅解,也不会在国际社会上留人诟病。其次,拖延道歉并不能够掩盖错误的发生,反而只会让后果持续发酵,例如受害者不断控告,新闻媒体持续追问,引发香港方面的经济制裁等等。而这些不良后果原本通过及时道歉,都能够妥善处理和避免。最后,这次人质事件的处理很难让其他国家相信菲律宾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而声誉受损才是菲律宾最惨重、最难以弥

补的损失。

而通过“行为戏剧主义”理论分析该案例我们又能总结出什么样有价值的经验和道歉原则,从而对未来各国政府处理类似问题有所裨益?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大致总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道歉动机上遵守人类共同价值优先原则。虽然道歉行为需要照顾本国利益或者党派利益,但是绝不能忽视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国家道歉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如在道歉时仅仅考虑赔偿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没有在价值原则上对自己行为进行重新阐释,可能会使得国家道歉行为吃力不讨好,造成道歉效果打折,比如菲律宾政府的第一次道歉。事实上,第二次道歉为什么效果较好,其原因就在于杜特尔特能够从“人道主义”关怀角度,对受害者提供最诚挚的道歉。

第二,时间选择上的借势原则。国家道歉行为可以是一种巧妙的外交表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上台,利用经过香港的时机,通过道歉,巧妙地传达了其上台后国家战略的转向——从和美国结盟转向和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第三,身份选择的配合原则。政府的道歉行为是一组组合拳,其道歉主体并不能局限于一种身份,相反应该重视身份的配合。阿基诺之所以备受指责,就是因为其不仅自身没有道歉,也没有找他人帮其道歉,由此造成了道歉身份缺位,反而被其政治对手埃斯特拉达利用,代替其道歉。如果阿基诺能够自己及时道歉,而且利用这个机会,和埃斯特拉达一起道歉,其不仅国际形象会得到加分,而且国内还可能免遭政敌攻击。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如能善加利用国际道歉,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政治收益。菲律宾的两次道歉都给道歉主体带来了极大的收益,不仅巧妙地通过批评阿基诺,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为自己在政治博弈中胜出增加了胜利的砝码。

第四,话语选择利用14策略原则。道歉者如果按照14条话语策略,撰写道歉稿,将可以有效地利用突发事件,转危为机,向国际社会展现自身负责任的形象。

第五,场景选择的组合原则。道歉主体应该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场景,彼此互相配合。比如如果菲律宾道歉,能够选择让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在香港面对受害人家属道歉,而阿基诺挑选和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道歉,或者在受害人还没有离开菲律宾时,到旅行团登门道歉,可能都不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反而可以塑造一个充满人性、敢于担当的国家形象。

最后,“行为戏剧主义”的创新性需要放在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对比关照中解读。虽然,两者存在一定的共同点:都关注社会问题,旨在探讨语言符号及其应用过程与社会互动的关系;都不是为语言而分析语言,而是以社会、文化实践为出发点进行语言分析;讨论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问题时都认为话语不仅是社会的表征,而且是社会建构;都认为话语和意识形态紧密关联;都认为话语是历史的、语境变迁的成果,同时也促使了语境和历史的变迁。但是,两者亦有很多不同点:批评性话语分析重视“分析”,擅长把整个语篇,分解成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而“行为戏剧主义”旨在“拼合”,其探究如何把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和语境要素拼合成一个语篇;批评性话语分析核心目的在于“揭示”,旨在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话语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而“行为戏剧主义”理论核心目的在于“改进”,旨在通过话语实现各阶层、各民族、各群体的理解和共存;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会批评理论,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所有组成部分都是某种权力的反映,而“行为戏剧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通过交往对话的理性化进程解决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sup>[8]</sup>总之,行为戏剧主义理论促使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落地到修辞学层面。哈贝马斯注意到了语言是一种全面沟通的媒介,提出言语行为应该是一种彼此尊重、开放信息、彼此协商、相互谅解、搁置分歧、重建共识的沟通行为。但是如何从言语行为的修辞策略上,实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而集成西方修辞学传统的“行为戏剧主义”理论,则在哈贝马斯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话语建设者面朝未来,肩负改造世界和社会的任务,运用“行为戏剧主义”方法,调动“场景、时机、话语、角色、动机”五要素,创造新的文本,塑造良好的舆论场,建构理性的公共领域,推进跨社群对话、跨文化理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 ①未来主义是西方流行的社会思潮,其旨在根据人类以往的发展和科学知识来预言、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同时规划和控制目前的进程,适应和创造更好的未来。表现在话语研究中,就是预测、适应并建设更好的话语世界。
- ②话语在话语分析中一直有两种理解,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话语,指社会或者文化中弥漫的思维、评价、行动和交流的方式,一种微观意义上的话语,仅指具体言说的话。此处指第二种。

参考文献:

- [1]甘莅豪.政治传播中的政府道歉行为分析[C]//新媒体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3-109.
- [2]Kress.G.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C]. In C.R. Caldas-Coulthard and M. Coulthard,(Eds.).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Routledge.1996:15-31.
- [3]Martin.批评性话语分析/积极性话语分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13.
- [4]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1-12.
- [5]年永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香港人质事件正式道歉[N].人民网,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80413/32306882\\_all.html](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80413/32306882_all.html),2021-07-23.
- [6]袁梦晨.财长表示菲将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N].新华日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20/c\\_1121178827.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20/c_1121178827.htm).2021-07-23.
- [7]李金明.“杜特尔特经济学”与中菲关系的改善[J].东南亚研究,2017(6):137-157.
- [8]胡范铸,张虹倩,周萍.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J].文化艺术研究,2021(1):1-12.

### **An Rhetoric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Dramatism**

——Taking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s Apology for the Manila Hostage Incident as an Example

GAN Li-hao, CAO Xiao-tong, TANG Xiao-hu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CNU, Shanghai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courage to apologize is a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ruling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any foreign governments use the dramatic symbolic meaning of apology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dramatis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s carefully constructed apology for the Manila hostage incident, and finds out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government's apology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vents: the priority of human common value in the choice of motivation, the combination principle in the choice of scene, the coordination principle of identity choice, the 14 strategy principle of discourse choice and the borrowing principle of time choice.

**Key words:** Constru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ehavior Dramatism; Government Apology; International Events; Manila Hostage Incident

(责编:叶 莉)